

抗日战争中 沦陷区青年学生投奔大后方的回顾

张振_{昆鸟}

在林林总总的中国近代史和抗日战争史著作中,我第一次看到讲述抗战时期的人口流动和迁徙问题的,是郭廷以的《中国近代史纲》,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1990年代中,刘大年邀我协助完成《中国复兴枢纽——抗日战争的八年》的编写时,我就提出应补上这样的内容。得他同意,由姜涛写初稿,他本人修改增补,形成书中的一节“国内人口迁徙”。里面分析了抗战期间中国人口流动的三种情况:一是战争初起时敌占地区人口内徙,难民流亡,从战地前沿向大后方迁徙;二是大批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奔赴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;三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同日军不间断地“扫荡”与“反扫荡”中,根据地人口不间断地在一定范围里反复迁徙流动。此书出版后我继续关注这个问题,渐渐领悟到,抗战时期还有一种人口迁徙,就是沦陷区青年学生奔赴大后方。

这里所说的青年学生,基本上是大、中学生,以高中生为主;他们不是在日本侵略军将到或刚到时逃出去,而是在日伪统治相对稳定地区的学校就读一段时间以后选择离开,投奔大后方,主要去西北西南各地。本文将主要说一点北平(日伪统治时期称北京)的情况。

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就被日军占领,1938—1939年这里的青年学生已有人奔赴内地和大后方,进入1940年代,出走者日益增多,1942—1944年达到高潮,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才终止。

这种迁徙的一大特点是秘密性。这是因为这种行动根本上带

有反日性质,在日伪统治下就不能公开,不能声张;为安全起见,一般除家人、亲属及最可信赖的师友外,绝不向其他人透露。在学校里,在班上,往往是某同学多日不见,才渐渐传出“已经走了”——去了大后方;有的甚至“失踪”多年后(抗战胜利后或更晚)才为人所知。与此相关联,这种行动总是零散的,大多是个人独行或少数人结伴同行,不可能采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。

根据我的亲身经历、见闻以及几位朋友提供的各自经历、见闻资料,战时北平青年学生赴大后方的可举如下一些事实。

1939年我进入北平辅仁大学附属中学,一直读到高三。这期间我的同年级同学陆续离校奔赴大后方的有王毓栋、邵绪平(他们两人与一位高年级的同学姜明结伴,于1941年4月6日悄悄离平南下,经上海、香港(时在英国统治下)、广州湾(时为法国租借地,即湛江),辗转广西桂林,是我们班上最早的出走者。另有邓国璋、莽克信、于缙荣、姚尚友、庄敬伯、王丙寅、张振_{昆鸟}。这个名单不一定完整,也许还有这样的同学我不知道;但只此9人出自一个年级(初一、初二、高一时分三班,初三、高二、高三时分两班),为数不少了。

学校里不只我们一个年级有人出走,其他班级也有,如高我一年的有于世斌等,高我两年的有鄂秉信等。极有可能那几年辅仁中学每个班级(主要是高中各班级)都有人去后方,去后方有一定的普遍性,只是详情不会有记录,也难以调查了。

这种普遍性可能存在于当时北平许多中学,各中学都时常有人走上后方路。例如,齐世荣1942年在四存中学读高一时随亲戚去重庆;同年在市立四中读高二的熙啸雄离校去洛阳;张奇1943年从汇文中学高中去西安(后去洋县入国立一中);同年崔行之从顺义(当时属河北省)牛栏山师范毕业去西安;这一年6月志成中学的高德超等5人高中一毕业就结伴前往内地洛阳,比他高

一班的同学张连举此前已去了兰州,他的亲戚、与他同龄的马振中市立第二中学毕业后去了内地;我的同乡李正民从河北北京高中(校址在地安门附近)去了重庆;其他中学当也有类似情况。

当时北平的大学不多,而大学生也多有去后方的。我确知的同乡中就有三人,一是赵东征,辅仁大学物理系学生;一为张肃文,就读于日伪政权下的北京大学工学院:他们都是我去后方的同路人。另一位是他们两人的亲戚,曾与他们住在一起,比他们年岁大,好像也读北大工学院,一毕业就去了后方,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。还有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李周的姐姐李陶钦及其同学陶凤娟二人于 1943 年一起从辅仁大学去成都,等等。

感谢徐秀丽的介绍,我得以读到赵宝煦的一本著作《途程——抱虚斋诗文稿》(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),里面一篇长文《“南行记”》,提供了抗战时期北平大、中学生(还有教师)投奔大后方的多个实例。据其记述,1943 年 1 月 21 日,“正在伪北大工学院化工系一年级读书”的该文作者本人与“读中国大学”的纪冬,“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的振英”(二人都是他竞存中学时的同学)及“一位伪北大物理系的一年级女同学若花”一行 4 人离北平南下,经商丘、亳州,过“阴阳界”脱离了沦陷区,到界首。在这里听到辅仁大学的名教授英千里、沈兼士由此去了重庆的消息。然后经洛阳去西安。一到西安“就有几个北平出来的学生跑来看我们”,他的“小学同学、毕业后一同考取市立第二中学”的“桂良也在其中”。不久又碰到“竞存中学的同学”国良、高贤以及“竞存中学时的体育老师赵瑞林”等“好几个熟人”,还有一个也是从北平逃出的学生”小杨。到重庆,先遇到姓田的辅仁大学学生(在北平时曾有联系,当时化名小贾,“是国民党在北平的地下工作人员,专门介绍青年南去”),后报考大学,“意外遇到许多北平时的老同学”,包括天岳,“还有高贤的侄子日新,也是竞存中学同学”。最后参加了一次教育部的“保

送考试”，被保送去昆明西南联大继续读书。（另有“不少同学，也都收到大学录取通知”：“天岳被重庆大学录取，春葵他们考进中央大学”。）从重庆去昆明途中，又遇到一位“竞存同学”刘士伟。（由此看来，竞存中学去大后方的师生真不少。）这个记述很能反映当时北平青年学生投向大后方的盛况。

综合各种情况可以看到，1940年代上半叶，在日本武力侵占下的北平各大中学内有一股潜流，不断把各校的青年学生涌向抗战的大后方。就一天两天、一校两校来说，流出量可能都不很大，但统全市学校之众，积数年之久，流出的总数应是可观的。

再从“流入”即这些青年学生到达大后方后的情况举一个事实。

我手头有一个名单，是抗战最后一年即1944—1945年度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柏溪分校（一年级生）“平津同学会”部分成员姓名，他们是：王正路、许世清、员（Yun）霖、戚其章、李鸿勋、章蕤、高德超、朱恩元、李季伦、施正鲁、张亨瑞（女）、易光焕（女）、周尔婉（女）、傅启勋、边云波、潘其德（女）、刘维垣、王尔毅、黄化一、刘梓荣、杨昭庆、王仲农、于世斌、孙增（女）、林彭年、戎国仁、刘文典、张作架、刘铁珊、蔡信、马春远。“平津同学会”顾名思义是由“曾在北平、天津上过学的”同学组成的，以来自北平者较多。这个名单是三位当事人戚其章、高德超、李季伦共同回忆起来的。他们记忆中这个同学会里有三四十人，现在只能想起这31人。（其中的马春远是七七事变之初随家长逃离北平、辗转到重庆的，不属本文所说的“沦陷区青年学生”。）另有邓道光、靳文光二人，无法确定。中大这个年级有这么些人从沦陷区平津“流入”，其他各年级必定也有；中大一校有，大后方其他许多高等院校也会有：举一反三，后方各高等院校中由北平流入的学生总数应该是可观的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与前举流出数相印证。

我手头有老同学刘敬坤转来的一篇 1 万多字的文稿《从孤岛到陪都》，是现居南京的潘君拯写的，详细记述他当年从沦陷区上海奔赴大后方的历程。他于 1941 年夏考进已迁入上海法租界的国立交通大学，12 月 8 日（日本偷袭珍珠港，挑起太平洋战争）日军进占租界，他决定脱离那个“孤岛”到内地去。1942 年 2 月 21 日（农历正月初七）他从上海出发去浙江，穿过日军封锁线，3 月下旬到龙泉浙江大学分校借读。5 月底日军打到金华，不得不再南逃，6 月底上路去福建，经江西、广东、湖南、广西、贵州，长途跋涉，最后于 10 月 1 日到达重庆。他当时 19 岁，全程大多只身独行，有时找到同伴，途中遇到不少原来熟识的同学或不相识的上海学生（其中有后来去了美国、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，途经赣州、贵阳时两次相遇）。由此可见上海沦陷期间青年学生奔赴大后方情况的一斑。

下面再举几例经历大后方之行者的自述。

戚其章。山东威海人，生于 1925 年 3 月。1941 年夏威海育华中学初中毕业，考入北平燕京大学附中高一。同年 12 月 8 日，日本兵封门，学生被赶出，辍学回威海。不久转去南京，入鼓楼中学插班高一。1942 年夏，鼓楼中学被日伪勒令停办，决定去后方读书。单身一人冒险出行，去安徽亳县；穿过“两不管”地带到界首；经洛阳、宝鸡去汉中，投奔西北医学院的一名学生，不遇；得该校另一名同学（曾在威海读中学）的帮助，暂时住下。10 月，去四川绵阳，拟入国立第六中学；因考期已过，该校拒收。巧遇原威海中学初一时的一同班同学，经他求六中一位老师介绍到江油县一水利工程处打工。1943 年秋再考六中插班生，跳了一班，直接读高三。1944 年毕业，去重庆考入中央大学。（录自 2007 年 6 月 11 日来信。本人现在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）

高德超。河北安新人，生于 1923 年。1943 年 6 月北平志成

中学毕业,即与同班同学朱之舫(女)、方之鸿、赵杰民、邹光明及邹的一位孙姓友人共6人结伴投奔后方。由北平乘车去徐州,转商丘,徒步一天到亳县。入住旅馆办了两件事:一是把“联银券”以1:13换成法币,一是把北平“居住证”留下。次晨,旅馆伙计带领出城门,通过日伪军的严格检查,进入“无人区”。行十数里到六里桥,一个永记不忘的地方,是内地的最前方,见野地里竖立着一标牌,上书“抗战必胜,建国必成”八个大字,大家心情振奋,不由得脱口高呼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在这里一个棚里办了登记。又上路,不久到达内地最前沿的界首镇。接着又经漯河到目的地洛阳。正值7月7日,见满街挂着国旗,大家都很高兴,就此分手。我这时已没有钱,便住进教育部和第一战区合办的“战地失业失学青年招致委员会招待所”(所内分4个大队,按文化水平分队,我们高中毕业以上包括大学生为第一队。总人数几百人),先后住了4个月;其间一度到西安参加中央大学和西北工学院的考试,考后拟在西安谋职未成,又回洛阳。10月底得到通知,二校皆被录取。当时河北省政府流亡在洛阳南郊,我去教育厅请求帮助,厅长贺翊新(曾在北平大同中学任校长)建议我上中大,并资助我法币1500元。“招待所”主任张选之为我向一战区办公室申请到1000元。我又从洛阳基督教堂得到救济金300元。于是离洛阳去宝鸡,一路搭乘便车经广元到重庆(11月)。中央大学报到后又办休学,去中学任教一年。1944年复学到柏溪。(综合2007年6月30日、7月5日、7月10日、7月25日4次来信。本人原在天津铁路工程学校工作,退休后住在天津)

聂宝璋。河北省(今天津市)蓟县人,1922年生。1935—1941年就读于北平市立第一中学。亲历了日本侵略军全副武装耀武扬威进入北平,校内出现表情冷酷的日本教员,日文也成了中学的必修课,于是畏惧之余增加了反感。1938年后,父辈兄弟三人相继

无端遭日军逮捕,由此仇日心绪与日俱增。1939 年,读育英高三的大哥第一个离北平奔向大后方重庆。又有一位表叔在辅仁大学读研阶段去了重庆。1941 年我高中毕业,决心不报考日本人控制的北大,而选择了法国教会办的天津工商学院。学院位于天津英租界,本来没有日本势力的痕迹,但入学不到半年,太平洋战起,校内增添了日本顾问和日文课,气氛越来越令人窒息。随之在表面平静的校园里渐渐形成一股摆脱压迫、逃离牢笼、寻求自由之地的暗潮。到了第二学年,就发现有的同学悄然不见了;时间一久,大家都知道是往“大后方”了。“去大后方”似乎成了一种时尚,每个学生都在自问,“人家走了,我怎么办?”对我来说,一时很难做出决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“亡国奴”的窒息感越来越强。书实在读不下去了,最后终于做出远行的决定。1944 年 3 月 18 日踏上征途,我们一行 5 人从北平前门站出发去河南商丘,转日占区前沿城市安徽亳州,冲过盗匪出没的“缓冲区”到界首。这里就算到了内地,每个人都有到家的感觉,沦陷区的压抑感没有了。由此去洛阳,又南下约百余里到白杨镇河北中学找到在那里任职的大哥。不久日军攻占洛阳,肆虐豫西南,河北中学被迫迁移;随校西去卢氏,经陕西蓝田,最后落脚于周至。在逃难中,原由北平结伴的 5 人已失散,个人决定去重庆。经过一段从未有过的生活困难,在重庆警察厅下的一个经济检查队找到一份“临时雇员”的工作;同时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去国立西南联大借读的申请。得其批准,1945 年初去昆明,进入这所自由空气极浓的学府,与一些先我而至的天津工商学院的同学重聚到一起。(摘自文稿《“自由之旅”故事》,2007 年 7 月 1 日。本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)

张振^{昆鸟}。河北正定人,1926 年 5 月生。辅仁中学读书时,进入高中后渐萌去大后方之志。高三时有了机会:在流亡于陕西的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工作的同乡赵清珍 1944 年秋来北平接家属,得

与搭伴同行。1945年1月末离北平去山西太谷,南下义棠,过汾河(日军封锁线),即进入抗战第二战区地界,精神为之一振。由此徒步北上孝义,折而西南,穿过吕梁山区,经大麦郊、隰县、大宁,到吉县,时为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所在。在吉县过春节(2月13日),渡黄河(河面冰融,涉水而过,冷彻骨髓),入陕西界到宜川。南下经韩城、合阳、大荔到华阴,乘火车到达目的地西安。在西安稍停顿,街遇中学同班同学王丙寅;到一个接待流亡学生的机构登记,领得一纸证书,成为后来考大学、进大学的有效凭证。虚报学历为辅仁大学在读生,经人介绍到岐山县初中教书(该校曾有辅仁大学数学系一学生任教)。大约两三个月后该校发生学潮,即辞职去赵清珍家(在郃县农村)寄居准备考学。此期间,得知中学同班同学邓国璋在四川阆中国立第四中学读书,彼此通了信;姚尚友在武功农学院读书,曾前去看望。6月底去宝鸡,乘长途汽车去重庆。找到同乡李正民。考进中央大学,11月到柏溪入学。(本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)

从以上4人的经历中可以看到:直到1944年初,从北方沦陷区去后方有一条主通道就是从安徽亳县去界首,其总站是洛阳。1944年春,侵华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,5月占领洛阳,这条路线被截断,所以1945年初由北平去后方就改走山西一路,总站为西安。此外可能还有别的路线。但不论走哪条线,行程中都有艰辛、凶险;而且到达目的地后,往往还要经受一段飘泊流浪,有时还要忍饥挨饿(高德超、聂宝璋都有过每日一餐的经历),而后才能找到立足之地,安定下来。在一定意义上,整个行程就是一场磨难,而这种磨难是那些青年学子自觉自愿自加自找的。在磨难中实现自己的愿望,他们无怨无悔。

这些青年学生为什么一心要去大后方呢?每个人可能都有一条两条或更多条独特的原因,但根本的一条是共同的,就是痛恨日

本侵略者，不甘心受敌伪统治，要找回自己的祖国，参与抗战或求学。正是这个共同的信念激励着他们抗酷暑，战严寒，跋山涉水，踏破千里征程；这也就造成一种战时特殊的人口迁徙和流动。这是一场持续数年的大流动，其始发点以平、津和上海两个地区为中心，遍及曾沦于日伪统治下有大、中学校的一切地区。这个大流动不仅满载着那些莘莘学子各自的追求，也寄托了沦陷区更多的爱国青年的憧憬。

追踪沦陷区青年学生进入大后方后的去路，大体上可看到三条：一，直接投身抗日斗争，如我的中学班友于缙荣加入空军即是；二，参加实际工作，如我的同乡赵东征当了中学老师；这两种情况似乎都占少数，多数则是三，继续求学：原来的大学生插班于各地高等院校，原来的中学生或早或晚纷纷考入大学。总之，他们大多很快就融入了大后方的大社会，基本上实现了各得其所。

至于这些人后来的发展和作为，那恐怕是千差万别。不过，我那位已定居美国多年的总角之交姚尚友的说法很值得注意：“在台湾，从 1950—2000 这中间，许多不同岗位上的主力人物，几乎大部分是曾有这种（从沦陷区到大后方）经验的知识分子，政府、军队、文化、财经，‘流亡学生’出身的甚多。”（2007 年 6 月 14 日来信）以此对比，可以说，在大陆，同一时间中，许多方面、特别是文化教育、科学技术、医药卫生等领域的专业骨干，有此经历者为数是不不少的。他们的专业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到大后方上大学打下的，他们也在当年的大后方之行中得到锻炼：事实证明，那条路对他们的人生成长是有益大有益的。

（作者张振昆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）

（责任编辑：李仲明）